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

夏海

李心草：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不遗余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近日在国音堂音乐厅结合自己多年的“追寻音乐之旅”，为2023级全体新生讲授了一堂情感真挚、启示深刻、鼓舞人心的“开学第一课”。

李心草首先带领同学们重温迎新音乐会尾声大合唱《领航》，通过对其歌词的深度解读探索音乐的内涵变化，启发同学们深入思考一名优秀的音乐工作者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对歌词、旋律的领悟与把控，用心挖掘、深刻领悟作品内涵，使音乐作品经久不衰、常演常新，把赤诚的爱党爱国之情融入音乐作品中。

“凡事没有捷径，没有一夜成名”，李心草作为音乐工作者，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已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事业的无限热忱、无比敬畏。

作为舞台上的执棒者、讲台上的教育者和学校里的管理者，李心草也语重心长地为新生指明了方向：一是勿忘师恩，常念师情，尊重师长，将恩师的教诲与关爱铭记

于心，贯穿在每天的学习、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二是珍视友谊，要珍惜在追梦道路上结识的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三是珍惜机会，要在参与比赛、艺术实践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提高专业技能，积累宝贵的舞台经验、深化对音乐的理解。四是注重积累，要用“一步步踏实的脚步”，谱写一个个生动的音符”。李心草说，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对素质的不断打磨、对文化的不断感悟，是成为德艺双馨、全面发展的音乐人才的关键。

“一位成功的音乐家需要百分之百的天赋，加上百分之百的努力。”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天赋和汗水缺一不可，热爱与勤奋相辅相成。李心草勉励中国音乐学院新学子要在积极探索、挖掘并珍视自己天赋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青春力量。

(记者 杨雪)

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的辩证法远承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道德经》“其中有辩证法”，近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毛泽东十分关注矛盾的普遍性，1937年9月，当看到艾思奇在《哲学与生活》一书说“差别不是矛盾”时，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妥的”，“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特殊性表现为矛盾同一的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论述了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论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既全面论述了矛盾的主要内容，又给出了运用矛盾的方法论，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

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一生坚持唯物辩证法，始终运用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现实，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更多地强调敌我矛盾，著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仔细区分了敌人与朋友的不同范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强调革命就是要“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进而取得更大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多地关注人民内部矛盾，著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

能解决”；“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不仅在宏观层面运用唯物辩证法，而且在各个领域也运用矛盾方法研究分析解决问题。在政治策略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发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现实，“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作为领导，就是要抓两头，带中间。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时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把抓两头、带中间制定为一项领导制度。1958年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时，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在军事谋略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深谋远虑进退的辩证法，特别是敌方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是为了更好地进攻。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能不能取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退却战略，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深入敌后”的退却战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最终实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运用“蘑菇战”的退却战略，挫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在经济工作中，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看待我国人口较多的问题，认为既是好事，又有困难，“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解决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

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具体办法是“两条腿走路”，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要求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目的是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运用矛盾的方法，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的控制”。通过两个中间地带，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从而为当时中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还运用矛盾的办法分析美国，认为美国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正是基于战略自信，毛泽东对于美国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抗美援朝是敢于斗争；1970年，毛泽东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是善于斗争。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坚持“要美就我，不就不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好一派泱泱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范！



我与黄永玉先生的两次见面

郝钧剑

黄永玉老先生过世了，享年99周岁。按照中国人讲虚岁的习俗，老人家享年一百岁。在记忆中我与黄永老仅见过稀罕的两面。鬼使神差，却在他去世前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

在他去世的前十天我应他家湘西的吉首大学之邀去讲学，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上午与下午都安排有课程，当晚即要返回北京。

到达吉首的当天晚上，还没下榻旅店呢，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乾州古城万溶江畔的“半亩方塘”小馆吃土菜。小馆是当地的一位诗人开的，门前便有“半亩方塘半亩荷”，当我们沿着荷塘曲径，披沐着清风小雨，走进店堂，迎面扑来一阵书香墨色，我脱口而出：“不愧是黄永玉先生的家乡。”

诗人和接待我的学校老师不约而同地问我您喜欢黄永玉啊？我说那当然，不仅喜欢黄永玉，还喜欢沈从文，喜欢湘西，喜欢《边城》。学校老师高兴地说，在我们校园里，就有座“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呢，当年黄永玉老先生回故乡亲自设计了这座美术馆，留下了如此隽永的建筑，以及当时几个月时间在此地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墨宝。

于是我硬是挤时间，次日早上八点赶去了博物馆，敬仰观赏之余还平生第一次斗胆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观赏后写下了“高山仰止”四个毛笔字，以表崇敬之情。

离开吉首我去了成都。那几天里在我们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的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活动与课堂中我多次提到了他老人家。一次是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黄永玉赠送郝钧剑书法作品

的岩彩壁画高研班上与同学们切磋，当说到岩彩画绚丽的色彩时，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地研习黄永老绘画作品中的那些丰富的画面。碰巧的是，这个高研班就办在成都的凤凰山上我们学院的研究院里。黄永老的家乡也叫凤凰，此凤凰彼凤凰都是凤凰，一个让人念叨的地方。

在成都，我与美院一起还策划了一个名为《芙蓉赋》的美术大展，企图邀请国内所有健在的大画家都来画芙蓉。会上当然首推的就是当今画界最年长

的德高望重的黄永老。而在后来拟名单时，才发现大家提到的好几位老人家都已经过世了，心里咯噔了不止一下，下意识地对正在做记录的丁金龙嘀咕了……不承想老人家就是在当天的清晨过世的，还是他家乡吉首大学的乡人最早向我报告的这个噩耗。晚上我独坐在孤灯桌前，不禁不断地回忆起我与她仅有的两次相见。

我第一次见到真人的他，是在天安门边上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黄永玉八

十艺展”，那是20年前，是我家姑姑郁风先生邀我去的。在现场我花了当时也算是一笔“巨款”的700元买了他的一本画册，我让郁风姑姑领我去请他签名，他对我说，现在人多，一签开了头场面就乱套了，以后你到家里来，我给你签。一晃过去了10年。10年前我第二次是在他的家里万荷堂见到的他。老人家居然还记得我，并欣然为我题写了“孝”字，还特意留下了“给郁家子弟”的上款。

他给我回忆了他与已经过世多年的郁风姑姑的友情。他说：“你那个姑姑呀，是我一生中不多的好朋友呢。但她总爱跟我争执观点，跟我‘吵’，‘吵’得不可开交时她会摔门而去。可是常常过了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她又乘着公共汽车回来了，那时候只有公共汽车。她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甩下一句：‘刚才那个问题是你对了，我错了啊！’说罢又摔门而去了。”老人家稍停片刻，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咳！现在啊，我常想她呢，只要电话一响，我就会想，在电话的那头，是郁风给我来电话了……”记得那天听完他的述说，我流了泪。后来老人家留我们一行在他家吃的晚饭，临别时他特别地对我说，欢迎你再来啊！

我知道他是又想起他的老朋友了。一眨眼又是10年。昨晚我在孤灯桌前默默地想着这些过往，想着桌前的这盏孤灯，是一支蜡烛呢，在燃烧着，在流着泪，想着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生。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

吴义勤：多维解读百年党史和北京文化

由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主编，王蒙、梁晓声、柳建伟、梁衡等50余位著名作家创作的《百年回声》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8月30日，《百年回声》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行，与会者围绕《百年回声》畅谈党史故事、守护城市历史文脉、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传奇的精神密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表示，这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和文学美感的献礼之作，旨在深刻挖掘和赞颂北京的红色历史。作家们通过散文形式，以现实中的场地、人物和文物为切入点，精心

构建了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这部作品不仅文笔优美、富有思想性，还具备出色的史料性和可读性。《百年回声》中由北京美术家协会的画家们特别创作的画作，准确地捕捉了历史人物的气质，与文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而独特的历史画卷。

在吴义勤看来，全书还充满丰富的情感和人文关怀，不仅是一部思想之书，更是一部精神之书。它深度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之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文脉和党的伟大成就的新视角。总体而言，这是一本集多维度艺术、历史和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作品，可视为北京党史的百科全书。(张丽)

李浩：唐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纵深化发展

日前，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辑(总第23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刊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每年出版两辑，主要刊发海内外关于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李浩表示，唐代文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为璀璨绚丽的一颗明珠，唐代文学研究也是古代文学断代研究中创获最多、成就最为突出的。《唐代文学研究》设作家与作品研究、文献研究、学术评论、专题研究、学术新秀等多个栏目，内容涵盖唐代文学创作与作家研究(除总论综合研究外，包括对诗、词、赋、散文、骈文、小说、俗文学等各体文学及其作家的研究)、唐代文学文献与史料研究、唐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唐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唐代文学的接受史与传播史研究、域外唐代文学及文献研究等。

李浩阐释道，《唐代文学研究》不仅关注唐代文学及文献本身

的研究，也关注唐代文学的接受传播研究；不仅有对传统学术问题的新探讨，也有对新的学术问题的发掘；不仅有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有辨析考据等实证研究；不仅关注学术动态，也关注学术史；不仅有唐代文学研究名家的成果，也有中青年学者的成果，还有初涉研究领域新人的成果……唐代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研究》推动了唐代文学研究不断呈现多元化、纵深化发展趋势，在引领学术、培育学术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树立治学示范的园地。(郭海瑾)

